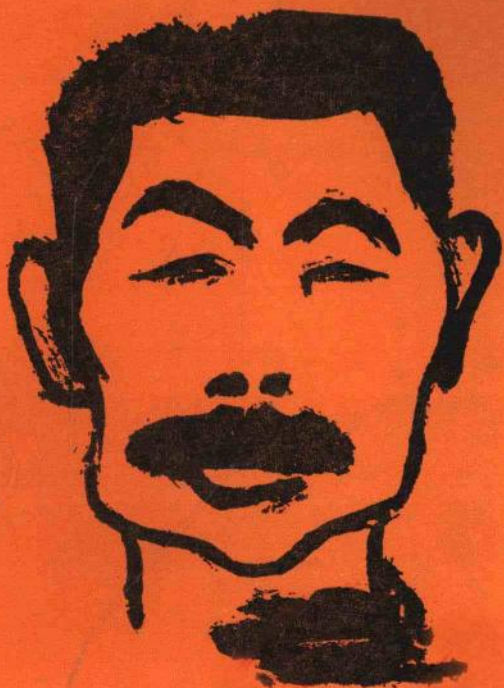


魯迅學刊



5

1983

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

鲁 迅 学 刊

第 五 期

辽出图临字 (1981) 第41号

编 辑 者 辽宁社会科学院
文 学 研 究 所

印 刷 者 沈阳新华印刷厂

出版时间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鲁迅和爱罗先珂的友谊·····	戈宝权	(1)
鲁迅先生与《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	唐 诃	(6)
关于鲁迅题诗签名送赠山易初男的《呐喊》		
《彷徨》·····	丁景唐	(13)
《鲁迅序跋集》的可悲遭遇·····	姜德明	(16)
关于《“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	朱金顺	(22)
关于鲁迅的若干笔名·····	鲁 歌 蒋 潇	(26)

鲁迅作品研究

关于毛泽东同志对“千夫指”的解释·····	师金成 陆雨村	(36)
《野草》拾零·····		(39)
《稽康集考》的背景和成因·····	俞 获	(46)
鲁迅诗本事		
——关于“千夫指”与“孺子牛”·····	徐元济	(50)
也谈《赠日本歌人》·····	张晓生	(56)
鲁迅论《杂纂注》辑·····	曲彦斌	(63)

鲁迅和他 的同时代人

关于高长虹结局之谜的通信·····	陈漱渝 师 陀 孔罗荪 汪金丁	(67)
范爱农死因探索·····	王德林 谢德铤	(71)
寿玺小记·····	余 时	(76)
关于我的父亲穆木天和鲁迅先生·····	穆立立	(78)
柔石研究资料索引·····	周芾棠	(83)

· 鲁迅和美术 ·

鲁迅生前准备编印而未及出版的木刻画册介绍……………李允经 (89)

争鸣园地

关于《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的通信……………锡 金 薛绥之 (97)

再谈《铸剑》的出典……………陈梦韶 (103)

有关《鲁迅全集》排印体例的一个小问题……………谷兴云 (105)

关于《呐喊》的版本和印次……………张树棠 (109)

鲁迅诞生的确切地名……………白玉琢 (110)

外国人眼中的鲁迅

美国汉学中的鲁迅……………〔苏〕A·H·热洛霍夫采夫
曲 直 夫 译 (109)

鲁迅……………〔苏〕A·D·波兹涅娃
孙 式 缪 译 (120)

评八十年代的《野草》研究……………陈 山 (128)

鲁迅研究之野草研究的新收获……………潘颂德 (135)

——简评《〈野草〉艺术谈》

鲁迅研究关于《阿Q正传》的第一篇专题论文……………施建伟 (140)

研讨作家文艺思想必须联系其创作实践……………公 望 (143)

~~~~~鲁迅研究著作巡礼~~~~~

近年来上海出版一批鲁迅研究新书……………林爱莲 (147)

天津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新著……………杨连仲 (150)

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又出书五种……………文编室 (151)

解放后国内鲁迅研究期刊简介……………纪维周 (152)

鲁迅和爱罗先珂的友谊*

戈宝权

在世界语文学的历史上，用世界语与日语写作的俄国盲诗人和作家华西理·爱罗先珂（一八八九——一九五二年）的名字，永远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一九八二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是他逝世的三十周年，尽管他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留下的《天明前之歌》、《最后的叹息》、《为人类》等童话集和童话剧《桃色的云》，不仅丰富了世界语文学的宝库，而且一直到今天还为各国广大的世界语者所热爱和传诵。

对我们中国的世界语者来说，爱罗先珂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世界语者很好的朋友。一九二一年十至十一月他在上海时，曾把他写成的称为“上海生活的寓言小品”的名作《枯叶杂记》，献给他在上海的朋友们和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一九八二年是他来到北京访问和在北京居住的六十周年，同时又是中国伟大作家鲁迅先生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和童话剧《桃色的云》出版的六十周年。这几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都同在一年里，虽然是个巧合，但在鲁迅和爱罗先珂之间结下的深厚友谊，却将永远是中俄文字之交史上值得纪念的一页。

二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鲁迅与爱罗先珂》的文章，

* 这篇短文，是应世界语《中国报导》之请而写的，译文发表在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的《中国报导》上。

发表在报刊^①上。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和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我们又发现了不少与鲁迅和爱罗先珂的友谊有关的新资料。

我们知道，鲁迅不仅热爱爱罗先珂的作品，而且他本人又是爱罗先珂作品在中国最早和最主要的一位翻译者与介绍者。早在一九二一年八至九月间，鲁迅就翻译了爱罗先珂的童话《狭的笼》，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他在《译者附记》中写道：“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日本放逐了一个俄国的盲人以后，他们的报章上很有许多议论，我才留心到这漂泊的失明的诗人华西理·爱罗先珂。”从不久前新发表的鲁迅写给他的弟弟周作人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当时想翻译和介绍爱罗先珂童话的打算。如他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这一天，得到了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天明前之歌》的日文本，于是他在同一天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大打特打之盲人之著作已到，今呈阅。虽略露骨，但仍尚佳，我尚未及细看也。如此著作，我亦不觉其危险之至，何至兴师动众而驱逐之乎。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接着他在九月四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又说：“爱罗样（君）之童话我未细看，但我想多译几篇，或者竟出单行本，因为陈义较浅，其于硬眼或较有益乎。”到了九月十日，他为北京《晨报副刊》翻译了爱罗先珂的另一篇童话《池边》时，他又在《译者附记》中写道：“五月初，日本为治安起见，驱逐一个俄国的盲人出他们的国界，送向海参崴去了。这就是诗人华西理·爱罗先珂。……他闪过了，我本也早已忘却了，而不幸今天又看见他的《天明前之歌》，于是由不得要介绍他的心给中国人看。”这也就是鲁迅最初注意到爱罗先珂和从事翻译其作品的开始。

爱罗先珂从日本被驱逐以后，在当年八月底就从苏联的远东地区来到我国哈尔滨，十月初又到了上海，同我国老一辈的世界语者胡愈之^②相识。我请教过胡愈之同志，他说他最初在上海虹口的一家日本人开办的按摩院里见到爱罗先珂，发现他讲着一口纯粹而又优美的世界语。由于爱罗先珂当时生活困难，胡愈之曾把他口述的诗文译成中文发表在报刊上，请他在上海世界语学会创办的世界语学校教课，并写了一篇《介绍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文字，刊登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上。

鲁迅最初和爱罗先珂发生联系，大概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旬的事。他在十一月四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得胡愈之信”，十一月五日又写道：“上午复胡愈之信。”这两封原信虽都不存，但从鲁迅在十一月十日为爱罗先珂的童话《鱼的悲哀》写的《译者附记》中却可以看出：“爱罗先珂在《天明前之歌》自序里说，其中的《鱼的悲哀》和《雕的心》是用了艺术家的悲哀写出来的。我曾经想译过前一篇，然而终于搁了笔，只译了《雕的心》。近时，胡愈之先生给我信，说著者自己说是《鱼的悲哀》最惬意，教我尽先译出来，于是也就勉力翻译了。”从此就不难看出，爱罗先珂当时已经知道鲁迅在翻译他的作品，而且推荐尽先翻译他的《鱼的悲哀》了。

到了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鲁迅在十二月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夜得沈雁冰^③信并爱罗先珂文稿一束”，鲁迅当即翻译了爱罗先珂的童话《世界的火灾》。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在日记中又写道：“上午得胡愈之信，又《最后之叹息》一册，爱罗先珂赠。”鲁迅又从其中翻译了《两个小小的死》。鲁迅说：“爱罗先珂先生的第二创作集《最后之叹息》，

……内容是一篇童话剧和两篇童话，这是那书中的最末一篇，由作者自己选定而译的。”

鲁迅和爱罗先珂虽然开始有了联系，但最初相见和结下深厚的友谊，却是一九二二年初的事。爱罗先珂到达北京的日期，据日本和苏联的研究者都说是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而且当即住到北京西城鲁迅和周作人的家。据我近年来调查和研究的结果，爱罗先珂由作家郑振铎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后，曾先住在东城俄国文学研究者与翻译者耿济之家，后由郑振铎和耿济之带他到鲁迅和周作人家去。周作人在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四日雪，上午晴。郑振铎、耿济之二君引爱罗先珂君来，暂住东屋。”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又有：“晴，大风，下午同爱（罗先珂）君往北大访（校长）蔡（元培）先生。”因此可以肯定，爱罗先珂到达北京的时间还应该更早一些，二月二十四日是他搬到鲁迅和周作人家住的日子。当时鲁迅住在前院，爱罗先珂住在后院。爱罗先珂除讲英语和世界语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因此住在都懂日语的鲁迅和周作人家就更为方便，而且可以得到他们的照应。鲁迅和爱罗先珂从此相见并开始建立了文学创作上的友谊。

就在一九二二年初，鲁迅完成了《爱罗先珂童话集》的翻译和编辑工作，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当年七月出版。同年四至五月间，鲁迅又在爱罗先珂的直接帮助之下开始翻译他的剧本《桃色的云》，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七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他在序文中说：“著者的意思却愿意我早译《桃色的云》；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一篇更胜于先前的作品，而且想从速赠与中国的青年”。一九二二年七月三日，爱罗先珂从北京起程，经过莫斯科前往芬兰，出席在赫尔辛

基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鲁迅在五日内翻译了他最新创作的童话《小鸡的悲剧》。十一月四日爱罗先珂回到北京，就在这不久以前，鲁迅又写成怀念爱罗先珂的短篇小说《鸭的喜剧》。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爱罗先珂离开北京回到苏联去了。鲁迅当年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和童话剧《桃色的云》，不仅是爱罗先珂在中国留下的珍贵的文学遗产，同时也是鲁迅和这位盲诗人与作家的深厚创作友谊的结晶。

① 最初发表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八日的《光明日报》上，世界语的译文见同年第六期的《中国报导》。

② 胡愈之现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曾译过爱罗先珂的《枯叶杂记》，编过他的一本《GEMO DE UNU SOLECA ANIMO》（《一个孤独的灵魂的呻吟》）。

③ 沈雁冰（一八九六——一九八一年），笔名茅盾，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当时正主编《小说月报》。



鲁迅先生与《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

唐 诃

鲁迅先生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末，在亲自编定的最后一本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收入了这年六月四日写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序文的最后一段说：“这选集，是聚全国出品的精粹的第一本。但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鲁迅先生的预见现在实现了，解放以后，我国版画艺术的队伍空前壮大，版画艺术的成就超越前人。但是序文中所说“聚全国出品的精粹的第一本”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却并未成集出书。现将鲁迅先生撰写序文的经过，记述于下。

从一九三一年八月鲁迅先生在上海举办木刻讲习班开始，至一九三四年北平木刻研究会^①、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成立，木刻作者大都集中在上海、杭州一带。由于国民党统治当局仇视抗日民主的进步活动，对以反映社会现实为内容的木刻画不能容忍。在木刻艺术横遭摧残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的木刻青年仍然紧密地团结在鲁迅先生的周围，和先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木刻作品经常由先生资助出版或介绍给进步报刊发表。在一九三五年全国木刻展览会展出的二

^①旋即改称平津木刻研究会。

百余幅作品中，就有近三分之一的作品是由鲁迅先生从自己的收藏中或受木刻青年委托所选送的。

恰恰和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木刻艺术的压制相反，社会各阶层的观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则因木刻艺术和人民大众的呼吸脉搏息息相关，而受到热烈欢迎，因而使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展出期间，成为各地报纸新闻和友朋谈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在文化艺术有深厚根柢的古都北平，以及随后展出的天津、汉口、上海等城市中，均获得极大的成功。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中说得明白：“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座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内心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版，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忱，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实迹具在，说它‘雅’，固然是不可的，但指为‘俗’，却又断乎不能。这之前，有木刻了，却未曾有过这境界。这就是所以为新兴木刻的缘故，也是所以为大众所支持的原因。”讲的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木刻运动的形势。

北平展出时，在络绎不绝的观众中，有不少人要求得到展出的作品，特别是国际友人及国内文化教育界人士，很希望获得一部分作品作国际交流及个人收藏之用。但因我们手边除过展出的作品外，有第二份印本的作品为数很少，除了适当地赠送少数观众外，远远满足不了更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编印一本选集，供国内外文化艺术交流，并为提供木刻的作者及热心赞助的人士留作纪念。

我们参阅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的《一个人的受难》、鲁迅先生自费集印的国内作品

《木刻纪程》、苏联作品《引玉集》、广州现代版画会选印会员创作的《现代版画》等。考虑到请书店出版印制，不仅因为木刻画反映现实，屡遭禁制，不易为出版商所接受；也因为当年北平的制版印刷技术比较落后，处理得不好，极易使原作失真。如果采用原版机器印刷，则可大量复制并能很好地保留原作的真实风貌，但征集及邮寄木版则很不方便。采取何种方式，确实需要慎重选择。

在北平展出闭幕的后一天，我就写信给鲁迅先生报告展览会的情况以及准备编印选集的设想，征求先生的意见，同时也请先生为选集撰写序文。先生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给我的回信中谦逊地说：“那一本专刊，我或者写几句吧，不过也没有什么新意思。”信中又接着说：“来信说印画用原版，我印《木刻纪程》时也如此的，不料竟大失败。因为原版多不平，所以用机器印就有印出或印不出处，必须看木版稍低之处，用纸在机器上贴高，费时费力，而结果还是不好。所以倘用原版，只以手印为限，北平人工不贵，索性用手印或手摇机印，何如？此一点须于开印前和印刷局商量好，否则会印得不成样子的。”①

根据鲁迅先生的提示，我们进一步作了研究。估计到木刻青年对革命艺术的热情以及我们彼此间的战斗友谊，如请他们自己手印后集成画册，是会得到他们赞助的。这样的画集，可以更好地交流作者和观众的艺术感情，激发观众的革命斗志，因而提高了木刻画的社会效果。我们决定之后，很快就选出作品四十幅，并分画作者请他们把入选的作品尽快地拓印寄来。为减轻作者手印的疲劳，印数限额为每幅五十

①同前版《鲁迅全集》十三卷二二页。

张。一俟画幅集齐后，即拟分别贴入韧纸制订的册页中。其封面书名、鲁迅先生撰写的序文，一律用木版刻印。仅余目录、后记，以及画幅的编码、标题和作者的姓名、地区，采用铅字排印后贴入。

在入选的四十幅作品中，和我们有直接联系的作者较多，如上海的野夫、新波、沃渣、温涛、曹白、马达等；广州的李桦、赖少其、唐英伟等；汕头的罗清桢、张慧；太原的鲁木；还有北平的许仑音、段干青、金肇野、董代羽等。另外一些木刻作者，如陈烟桥、何自涛、陈铁耕、刘岷、张望等，则是经别人的手将作品寄来参加展览，有线索可以联系的。这样就可以保证通知发出后，在一定时间内能将作品收集起来。至于其余的好作品，如当时还在国民党狱中的作者江丰、胡一川、力群、夏朋等，以及缺乏地址及联系人的作者，则只好暂付缺如，准备将来有可能时，再用原画制版印刷。作品的选取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因而这本选集，无论从题材内容、表现形式、艺术风格、代表地区等方面，均能继一九三四年鲁迅先生选印《木刻纪程》之后，如实地反映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全貌。

在一九三四年全国木刻展览会筹备期间，从十一月七日鲁迅先生以何干署名寄来第一批木刻起，我们便以筹备处或个人的名义开始和鲁迅先生通信联系。^①关于编印选集的

①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十五卷《日记》记载：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八日共收木展筹备处四信，其中第一信由我执笔作复，其余三信则不记出于谁的手笔了。另外，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起，平津木刻研究会成员中和鲁迅先生通信联系的尚有段干青、周涛、赵越。许仑音仅寄过一次木刻画，一九三五年春因病早逝。

事，鲁迅先生除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给我的复信外，二月十四日给金肇野的复信也提到这件事。关于序文，信中说：

“文章我实在不能做了，一者没有工夫，二者材料不够。近来东谈西说，而其实都无深研究，发议论是不对的。”^①该时选集所收入的原拓木刻尚未到手，鲁迅先生也没有动手写序，故有这样的说法。这一年的夏天，我又给先生去过几次信，先生也间有复信，信内一定会提到编印选集的事。至五月三十日鲁迅先生收到我的另一信后，六月五日的《日记》中即记有“上午寄唐诃信并《全国木刻展览会专辑》序稿一篇”^②，则先生于我们反复联系后，终于把序文于六月四日写好后寄出了。可惜先生的这几封复信，均在历年动乱中不幸遗失，无从查考了。

据当时北平与上海之间邮信时间的估计，鲁迅先生为选集所写的序文，大约在六月十日前后收到。因为序文将以原稿刻制拓印，故此先生特地选用了质地韧薄匀净的纸张抄写，为刻字工人贴在木版上刻制时提供了方便条件。

收到鲁迅先生写的序文及大部分作者手印的木刻后，约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上海展览之后，我把它送到北平琉璃厂街去刻版。刻制的商店在东琉璃厂，店名不记得了，前肆后坊，坊中有雕版技术极好的工人。经过精心刻制，鲁迅先生健劲清秀的字迹以及书法的整体结构，便再现在创制平整、厚度和铅字等高的木版上。如鲁迅先生所熟悉的情况，“北平人工不贵”，约十六开大小两块版六百字的序文，工料费仅为银币二元。

①同上版《鲁迅全集》十三卷60页。

②同上版《鲁迅全集》十五卷二三〇页。

事情不尽如我们的预期。至一九三六年春天，入选的作品大部分均由作者辛勤地拓印并寄来了，大约收到近三十幅。其余作品则以作者和我们失去联系，屡经催询，迟迟未来。我们于少部分作品久候不来之际，计划先将手边已有的作品、鲁迅先生序文的拓本，以及准备排印的目录，后记等收入册页，其余则在册内预留空页，以俟未到作品寄来后再陆续补入。但夜长梦多，一九三六年春金肇野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捕入狱，存放在他沙滩公寓中选入《专辑》的作品，以及展览会陈列过的作品，全数被军警查抄散失，因而这本选集在黑暗的旧中国，就这样地被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扼杀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我写信给鲁迅先生请教翻译德文本《木刻画与胶版画》中的问题时，把《专辑》的遭遇告诉先生，并将先生手写序文的拓印本寄去。先生在九月二十一日复信中，以惋惜的心情写道：“得到九月十六日信并给我仅存的序文，感谢之至。但展览会收场如此，真令人怅然。”^①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生终以久病之身，工作过劳，不幸与世长辞。先生撰写的《专辑》的序文，刊载于同年十一月我和黄既等编印的《文地》月刊第一期《哀悼鲁迅先生特辑》中。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不在北平，以后知道存放在我中南海运料汀宿舍中的鲁迅先生所写序文的木刻版，也在动乱中遗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先生的手迹陆续影印出版。鲁迅先生手写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的原

①同上版《鲁迅全集》十三卷四二八页。

稿，以及我手印的木刻版的拓印本，均收集在北京文物出版社编印的《鲁迅手迹》内。前者有少数改动的地方，后者则为誊清本，经刻制及拓印后，和中国古代碑帖的拓片一样，成为黑底白文。

从鲁迅先生撰写《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的经过，可以看出先生对新兴木刻运动的深切关怀，以及对革命文化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这些事迹，可以世代地作为我国人民向先生学习的具体范例。



关于鲁迅题诗签名送赠山县 初男的《呐喊》、《彷徨》

丁景唐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在哈尔滨参加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读书班学习的时候，曾给我工作的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写了一个汇报，登在社内刊物《文艺通讯》上，不意却引起了《解放日报》编辑同志的兴趣。待我返沪后，报社征求我的同意，替我拟了一个《鲁迅签名本〈呐喊〉、〈彷徨〉》的题目，作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刊登在同年八月二十六日《解放日报》上。

这篇短文，本是我在哈尔滨王观泉同志处，见到日本三省堂书店编印的《鲁迅诞辰百年展目录》中，有关鲁迅研究书目和日本翻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左联”期刊影印本等情况而写的。文中介绍了内山嘉吉写的《这些书是怎么到我手的——鲁迅签名本〈呐喊〉、〈彷徨〉》。我虽在大学时读过二年第二外国语（日文），略识日文中的几个字句，揣测得出“一知半解”的意思，但远达不到翻译的程度。于是就请观泉代为译出。大意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内山嘉吉在送书归途，路经东京水道桥站，见一小旧书店门前堆满旧书。无意之中见到埋在几册旧书下有《呐喊》和《彷徨》两书，引起了内山嘉吉的注意。原来这两册书上各有鲁迅的题诗、签名和印章。他只花了价值两杯咖啡的钱，买了这两本宝书，飞快地骑车回家。